

论“情感真实”

——对生成式视觉大模型下新闻真实范式迭代的探讨

◎ 喻国明^{1,2}, 黄容², 张洛瑜²

(1.北京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 100875; 2.北京师范大学 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 北京 100875)

【摘要】文章聚焦“技术—情感—真实”的互动关系, 探讨生成式视觉大模型驱动下新闻业的情感转向与情感要素服务新闻真实的构建实践。面对新闻业的新兴生产实践, 传统新闻真实范式的可解释性遭遇瓶颈。基于此, 文章提出“情感真实”的概念, 从范式层面解析新闻真实的范式转换, 从技术驯化、认知冲突、范式重构三重路径分析“情感真实”正当性确立的过程。面对“情感真实”进入真实性范畴所带来的风险挑战, 文章从真实性溯源、情感调控、认知助推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技术治理路径, 以促进新闻业在创新与规制的平衡中稳步前行。

【关键词】Sora 生成式视觉大模型 情感真实 新闻真实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5)10-053-08

【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5.10.007

随着AIGC技术深度介入新闻生产逻辑, 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建构的虚拟—现实双向接口, 正在重构人类认知世界的媒介化路径。被传统的新闻实践所遮蔽或边缘化的情感要素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心。情感作为人们对外部世界感知的总和, 被视为促进社会行动的积极力量, 即使在极其强调客观理性的新闻生产领域, 情感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1]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视觉大模型帮助人类在新闻实践中构建起依靠传统新闻生产逻辑所不能实现的复杂真实, 通过把握核心情感进而勾连起动态且多维的事实, 让公众透过客观的、单一的、机械化的叙事视角, 看到了丰富流动的立体真实世界。当信息生态系统中主客体关系发生结构性位移时, 新闻真实作为支撑新闻传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价值“元点”, ^[2]其范式迭代已成为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 确保社会认知生态中媒

介真实的基石作用至关重要。对于加速数字化转型的中国社会而言, 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视觉大模型驱动的新闻生产既可能通过沉浸式叙事增强公众对复杂议题的理解, 也可能因深度伪造、情感操控等技术滥用加剧信任危机。技术赋权与风险共生的矛盾, 凸显了重新厘清新闻真实边界的迫切性。换言之, 技术突破不仅重构了新闻生产的工具链, 更以“超真实”的媒介景观颠覆了传统新闻真实的认知框架。本文首先聚焦“技术—情感—真实”的互动关系, 探讨生成式视觉大模型驱动下新闻业的情感转向与情感要素服务新闻真实的构建实践。其次, 引入范式转换理论, 在范式层面解析新闻真实的新、旧范式转换, 并从技术驯化、认知冲突、范式重构三重路径分析“情感真实”正当性确立的演进过程。最后, 探讨“情感真实”纳入新闻真实性范畴隐含的社会风险, 并提出风险治理的技术路径。

作者信息: 喻国明(1957—), 男, 江苏常州人,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 新闻传播学、新媒体研究、传媒经济学; 黄容(2002—), 女, 江西宜春人, 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研究助理, 主要研究方向: 传媒经济学、传播行为研究; 张洛瑜(2001—), 女, 北京人, 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研究助理, 主要研究方向: 政治传播、新媒体研究。

一、情感转向：生成式视觉大模型驱动下新闻真实的构建实践

“人类的传播活动不断探索扩展感官本能的媒介，以期实现更高效的意义建构。”^[3]媒介技术是影响新闻真实的重要维度，视觉技术的发展能够不断完善新闻真实呈现的形态，以生动逼真以及有说服力的表达方式，为新闻工作者的报道提供依据，并影响新闻受众对真实的认知与判断。本文聚焦“技术—情感—真实”的互动关系，认为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视觉大模型作为视觉技术的发展前沿，极有潜力成为新闻生产变革的断裂性节点，其强大的模拟现实与情感仿真能力，将“情感”这一人类信息传播历程中典型“事件”的价值推至更高点。^[1]被传统的新闻实践所遮蔽或边缘化的情感要素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心，服务于新闻真实的构建。

1. 技术驱动新闻业的情感转向

传统新闻生产的客观记录模式，主要依靠文字信息与摄影、摄像技术反映新闻事实，高度依赖记者的在场性，记者须亲临现场采集一手信息，并通过多方信源交叉验证以还原新闻事实。然而，物理的在场始终有无法覆盖的场域，如战场、灾区等不可及现场，在场受限的传统记录无法满足人们对新闻真实更高层次的需求。即使在场性满足，平面化媒介相对片面、静态的记录特性也无法捕捉动态流变的新闻细节与情感流露，难以承载多维立体的感知期待。在受众习惯以情绪感知来判断信息真伪的后真相时代，亟须在事实的客观性与感知的主体性之间建立新型对话关系，以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沉浸共情的认知需求。

随着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视觉大模型的出现，人机协同的新闻生产模式改变了新闻真实构建的行动者网络。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社会可以用“网络”来解释，这一网络由人和非人的行动者联结而成，二者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都具有能动性。^[4]作为非人类行动者，生成式视觉大模型建构起虚拟—现实双向接口，正在重构人类认知世界的媒介化路径。Sora不仅能够模拟现实世界的静态属性，更具备捕捉事实动态变化和复杂性的能力。^[5]同时，生成式视觉大模型具有其他生产主体难以比拟的情感仿真和情感唤醒能力。通过大规模情感数据训练，Sora生成的视觉内容能够模拟出与文本描述相匹配的情感状态，不仅能够模拟人类面部微表情、肢体语言等显性情感表征，更可依据传播情境动态生成符合事实情感倾向的视觉符号系统。

以生成式视觉大模型为技术支撑，数字时代的新闻

生产开始转向情感建构模式，利用生成式视觉大模型强大的碎片信息聚合与情感仿真能力，在尊重客观真实性的同时，以真实情感为核心，对客体事实进行能动性加工创作，以文生视频的方式，多角度、全方位以及全过程模拟新闻现场。情感建构模式能够超越在场性的限制，让公众透过所谓客观的、单一的、机械化的叙事视角，看到了丰富流动的立体真实世界，唤起受众的情感共振，填补了新闻报道的空白。

2. 情感要素服务新闻真实的构建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与根基，早在1993年，甘惜分主持编撰的《新闻学大辞典》就指出对真实性的要求应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每一事实的反映是准确可靠的，每一细节都经得起检验与推敲；二是从整体上反映时代的真实；三是反映了事件的本质和时代的本质。^[6]后人将其更为明确地阐述为“不仅要做到所报道的单个事情的真实、准确，尤其要注意和善于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去把握事物的真实性”。传统的新闻生产实践对于新闻真实的追求大多仍停留在第一层次即“事实真实”，这些具体的新闻报道累积起来也不必然能够呈现事实的完整面貌，更不用谈透过现象触及本质意义上的真实。

而在情感构建的新闻生产逻辑下，情感要素重新受到重视，有助于实现更高层次新闻真实的构建。一方面，情感成为认知层面用户新闻信息加工过程中还原真实性的必要构造因素，情感要素在可控的范畴内丰富了具体真实的表达，达成感官上的总体真实。如《卫报》早期推出的VR项目“6×9”，通过模拟6英尺×9英尺牢房的场景再现了监狱内的幽闭体验，赋予了受众任何图文新闻都无法传达的在场感，通过情感的触达与亲身感受的模拟唤起用户对收监人员的感性同情以及对监狱体制的理性反思。^[7]

另一方面，生成式视觉大模型所塑造的核心情感，可能越过某些具体要素的失实，通过受众共情间接服务于本质真实。大量的传播实践表明，生成式视觉大模型技术辅助创作的新闻拟像，并不是脱离客观事实的完全虚构创造，其具体要素也许无法完全与现实世界一一对应，但其中蕴含的与现实世界共通的真实情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现实真相。以AI生成的“2022重庆山火图”和土耳其地震后的救助场景为例，图片或视频内容中的人物也许不能对应现实世界中任何真实的人，但可以指代自然灾害面前既脆弱又强大的人类，能够唤起受众强大的情感共振，培育有意义的人类行为。^[8]对于利用

生成式视觉大模型辅助创作的新闻内容而言，对真实的认识不应完全局限于新闻是否如实反映和再现了现实，而应看新闻能否激活受众对真实的认知和感受，以及是否揭示了社会问题的本质，并达成新闻价值意义上的完满。

二、范式迭代：“情感真实”进入新闻真实性范畴

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认为，常规科学以一种范式为典型特征，该范式规定了共同体所研究的谜题和问题；一切运转良好，直到范式所规定的方法不再能应对一系列反常，遂产生危机并不断持续，直到有一项新的成就重新指导研究，充当新的范式。^[9]库恩的范式转换主要指向自然科学的研究，其本质在于一种新的认识世界方式对旧有认识方式的迭代。^[10]

新闻真实的范式迭代同样符合这一转换规律，在媒介技术深入演化的背景下，面对新闻业的新兴生产实践，传统新闻真实范式的可解释性遭遇瓶颈，认知层面的情感真实逐渐成为新闻真实的新维度，在范式层面重新厘清新闻真实边界，成为新闻业长足发展的迫切需求。本文进一步阐释情感作为报道副产品的传统新闻真实范式与情感作为认知界面的新范式，以及在二者激烈转换过程中，“情感真实”正当性逐步确立的演进路径。

1. 新闻真实的传统范式：情感作为报道副产品

传统的新闻真实观念将新闻真实界定为新闻与其对象（新闻事实）的符合性与符合程度，^[11]要求新闻报道与客观事实绝对、完全一致。^[12]这种新闻真实观本质上是要求属于认识论范畴的新闻真实遵循本体论的思维逻辑，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认识对象的独立性与不可还原性，^[13]这种看似绝对的新闻真实，实质上只是立体、流动的现实中单一的、碎片化视角的事实真实。

同时，传统新闻专业主义将客观性视为新闻真实的核心准则，将情感置于对立面，认为记者情感、当事人情感表达或情感化叙事都可能损害报道的客观性。^[14]记者常被要求以“零度情感”风格写作，通过克制主观情绪来维持报道的权威性，在这种逻辑下，情感被视为新闻生产过程中无法完全剔除的“附带产物”，而非主动构建的要素。尽管如此，情感仍以隐蔽方式渗透于新闻生产，记者对报道对象的选择、叙事框架的搭建，本质上都隐含着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15]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出比以往更为庞杂的信息生态，人机协同的新闻生产模式也颠覆了传统新闻真实的认知框架。追求与事实完全符合、绝对客观的新闻真

实观念难以应对数字媒介环境下产生的新的现实问题，这种曾构筑起新闻实践准则的新闻真实性理念逐渐失去了灵活性，表现出难以实现和维系的状态。^[16]

2. 新闻真实的新范式：情感作为认知界面

当旧范式的危机出现并不断持续时，往往蕴含着新范式崛起的可能。有学者指出“情感是泛众传播下揭开事件真相的推动力量”，新闻业的新兴生产实践也揭示了用情感建构公众认知和行动的重要性，新闻真实的范式重建需要在尊重客观性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情感的价值，以唤醒公众的情感意识为立足点，将“情感真实”纳入真实性范畴。^[17]

“情感真实”本质上是一种主体论层面的新闻真实观。有学者提出真相并非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基于证明和推理获得真相的动态过程本身，同时受到政治、文化、经济及技术等多重社会条件的制约，^[18]这种观点背后是对主体论意义上新闻真实的唤醒。主体论关注个体、意识和认知主体如何感知和理解世界，认知主体参与的新闻真实并不是一种本源状态的本体信息的真实，而是一种主观意义上的再现真实，通过传播状态的事实信息，达成主体认识意义上的真实性。^[19]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认知过程与身体的动作、感知及体验等具身结构的深度融合，^[20]确立了身体感官与体验在认知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视觉大模型生成的新闻内容通过多模态叙事重构了受众的感官体验，塑造了其对于新闻真实性的认知框架。在这一理论视角下，情感发挥了其作为认知界面的核心功能，感官具身触发了情感的联结机制，通过情感共振，促进个体理解和认识现实世界层面达成新闻真实。

本文充分肯定了生成式视觉大模型作为媒介物，在新闻生产实践中对于认识实现与共识塑造的能动作用，同时强调“情感”这一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要素对于新闻真实实现的重要意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情感真实”这一新兴真实性理念。生成式视觉大模型的介入，使得新闻真实不再局限于新闻报道与客观事实的完全符合，而是拓展为一种通过把握核心情感进而勾连起动态且多维的事实的“情感真实”。尽管“情感真实”并不以完全符合客体事实作为最终目标，但是能够通过把握核心的真实情感，帮助传受双方达成共识，进而实现新闻真实从机械复现到拟真共情的范式跃迁。

3. “情感真实”正当性确立的演化过程

人工智能视觉生成技术迭代不断冲击着传统新闻真实观的边界，新范式在技术日臻完善、认知冲突逐渐消解的过程中逐渐确立。在此过程中，新闻业经历了技术

驯化期的防御性隔离、认知冲突期的真实性讨论，最终在范式重构期逐步确立起“情感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动态平衡机制。这一演化路径的本质，是在技术突破不断消解传统真实观绝对性的同时，通过算法与人文的博弈对话，为数字时代的“情感真实”开辟新的正当性的可能。

(1) 技术驯化期：催生“合成真实”争议。早从2014年提出的生成式模型，即基于博弈论纳什均衡原理的生成对抗网络（GAN）开始，就重塑了数字内容的生产逻辑。生成器通过模拟真实数据分布而生成合成样本，判别器则持续优化对真伪数据的鉴别能力，二者在对抗性训练中逼近均衡状态。^[21]这一技术架构使机器首次具备从文本到图像、从静态到动态的多模态生成能力，如麻省理工学院2019年开发的Speech2Face模型，能通过语音片段合成对应人脸的面部特征，甚至驱动静态照片生成动态表情。同年英伟达推出的GauGAN模型，使用户仅需简单涂鸦即可生成风景图片。此类突破不仅降低了数字伪造的技术门槛，更催生了“合成真实”的争议——生成内容虽在整体视觉呈现上逼近真实，却存在瞳孔不对称、肢体结构异常等细节上的可识别破绽，且视频生成中普遍存在帧与帧间连贯性缺失的技术缺陷，“一眼假”的技术局限性使得生成式模型与再现真实的视听目标相去甚远。

“合成真实”的数字内容产品虽然未被正式应用于新闻生产中，但许多主流媒体对AI生成的内容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并采取“技术隔离”的防御性策略。《卫报》于2019年率先建立AI生成内容警示标签制度，要求所有算法合成素材需标注技术溯源信息；《纽约时报》则通过法律诉讼抵制生成式AI对其内容生态的侵蚀，指控科技公司未经授权将新闻作品用于大模型训练。这种防御姿态折射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专业生产权的解构潜能，也预埋了新闻真实性范式冲突的关键伏笔。

(2) 认知冲突期：引发新闻伦理讨论。2020年，以去噪扩散概率模型（DDPM）为代表的生成范式革新，标志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进入技术跃迁期。相较于GAN，扩散模型通过渐进式去噪机制实现了更高保真度的图像合成。^[22]在此技术优化背景下，基于DDPM架构的Midjourney迅速崛起为文生图领域的标杆工具，其生成图像在皮肤纹理、光影过渡等微观维度已逼近物理真实。如2023年Midjourney生成的“教皇穿羽绒服”等虚假图像，其整体视觉真实度已突破人类辨识的阈值，导致公众难以察觉合成痕迹，从而跨越恐怖谷引发的非人感排斥。

此外，不少AI生成的战争导致平民伤亡的图片与视频新闻出现，试图通过引发人们的悲悯情绪，触发全球人道主义声援。AI生成技术渗透媒体生产链，引发了学界与业界有关新闻真实的讨论。传统专业主义新闻立场认为新闻真实的本质是事实真实，而AI生成内容缺乏客观事实的锚定点，应视其为虚假信息而非真实新闻。但随着数字新闻业的情感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情感对于理解现实世界的重要性，他们主张这类AI生成的新闻内容符合公众对战争事件的想象框架，不仅能触发强烈情感共鸣，还能促成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其蕴含的真实情感也被视作新闻真实的衡量维度之一。争论背后是技术突破引发的新闻真实界定的认知冲突，冲突的激化恰似范式革命的催化剂——传统真实观的绝对性被质疑，倒逼新闻业直面真实性评价体系的范式危机。

(3) 范式重构期：建立“真实性光谱”评价机制。随着Sora的出现，视觉生成技术日臻完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已不再停留于是否真实的二元判断，“情感真实”的重要价值也在业界实践中逐渐明晰，新闻真实进入范式重构期。在这一时期，应当重新确立起新闻真实的评价体系，寻求新闻生产在坚守真实性根基与唤起情感共振间的价值平衡，推动“情感真实”正当性的确立。

本文提出“真实性光谱”概念作为认知意义上真实性的动态评价机制，基于“政治光谱”的描述方式，认为新闻真实的范式迭代是一种光谱式的过渡关系。“真实性光谱”将客观真实性与情感真实性视为“连续统”的两端，主张媒介内容的生产与传播应根据具体语境，在客观真实与“情感真实”之间进行动态调节。如在气候变化议题的传播中，应用AI生成的冰川消融影像。若仅追求客观真实，可能因科学数据的抽象性导致公众认知的疏离；而过度依赖情感真实，则可能陷入引发社会恐慌的伦理争议。“真实性光谱”框架通过“真实的连续统”消解了真相和情感非此即彼的二元困境，生产者可以依据新闻类型调节事实真实与“情感真实”的权重。如调查报告需强化数据溯源与信源交叉验证，而人文特写则可借由技术生成的沉浸式叙事，在保障事实透明的前提下，激活受众对结构性问题与社会矛盾的情感体认。

这种动态评价机制的本质，是将真实性从静态的“标准答案”转化为技术时代的认知调节策略。由此可见，“真实性光谱”的终极目标并非消解客观性原则，而是通过承认“情感真实”的认知正当性，在技术赋能的传播场景中重建“真实可信的新契约”。

三、视觉“再造”：“情感真实”带来的风险挑战

“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23]鲍德里亚对于“超真实”的感叹在智能时代的视觉景观中得到了验证。当“情感真实”进入真实性范畴，情感联结机制在实现新闻的认知与理解效度、建立公众信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但情感要素的泛滥可能导致信息生态的失序化风险，生成式视觉大模型“再造”的视觉景观对基于传统媒介经验所形成的“眼见为实”的媒介观造成巨大的冲击，易引发情绪极化、信任消解等更深层次的社会震荡效应。

1. 情绪感染下的认知遮蔽

人类作为高度依赖视觉的生物，其认知机制具有显著的视觉偏向性。认知科学研究认为，视觉信息能够激活启发性认知系统，相较其他感官通道更快、更精准地传递环境变化，且通过图像优势效应更易引发关注与记忆固化。人类在面对复杂事物时需要进行长链思考和逻辑推理，而视觉思维倾向于短链思考和直觉判断。视觉认知倾向于简化多元素信息，引发认知偏差，使得人们习惯于快速、非理性的信息处理模式，削弱个体的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性反思。^[24]视觉信息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直观性，能够迅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并在短时间内引发强烈的情感反应，这也为标签化、刻板化印象的形成与泛在提供了土壤。

生成式视觉大模型技术赋予新闻生产者极大的创作自由，在情感构建模式下，基于新闻生产者意识控制和灵感变异的新闻产品如果不加约束，易成为激发偏激情绪、诱导群体对立与社会分裂的工具。在后真相时代，情感渲染强烈的视觉内容凭借较强的传播触达优势，加剧了社会的情绪极化现象。信息爆炸时代，碎片化、情绪性的视觉冲击，在人们普遍感到压抑、内卷和无力时，极易成为强势传播力量。如视觉迷因的泛滥与用户沉溺短视频的倾向相伴相生，充满自我压抑和反抗情绪的视觉符号极有可能引发群体负面情绪的极化，使得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人群易在视觉信息的推动下形成固化的观点和对立的态度。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和传播那些符合自己情感和信念的视觉信息，而忽视或排斥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信息。这不仅导致了信息的单一化和同质化，还会导致社会的分裂和对立。技术的便利使得当下的传播实践中存在大量情感渲染强烈的视觉内容，让带节奏和仇恨情绪对真实世界的认知造成了

巨大遮蔽，这类视觉信息看似直面现实，实则以情绪之“偏”概真相之“全”。

2. “超真实”悖论引发的信任危机

在促进“情感真实”的同时，生成式视觉大模型的应用若不加以规制也会造成虚假信息的泛滥。深度伪造技术使得虚假信息的生成更加高效和逼真，足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水平，若不在生成视频中标注AI来源，或不细究影像细节，便很难识别人工智能生成的影像，而这也可能会加剧另一种幻象的生成，即生成式视觉大模型引发的“超真实”悖论。通过海量数据训练生成的虚拟仿真虽符合视觉真实标准，但缺乏现实指涉对象，导致受众在信息处理过程中遭遇真实性困惑。当混杂着事实和幻觉的内容被下放至每个与之对话的用户个体，真假分辨将变得有门槛，即使是有批判思维的人，长期浸染于充斥着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的信息生态中，也会因为认知疲劳而逐渐丧失辨识真相的能力，最终导致“真实虚无主义”的蔓延。

深度伪造技术席卷信息生态将会带来整个新闻行业与社会层面的连锁反应，动态的伪造影像使得蓄意、恶意的欺骗肆无忌惮，引发道德和法律争议，并使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信任危机。公众的不信任并不是只针对深度伪造视频本身，而是延伸到整个互联网和新闻业。一方面，公众会泛化地认为视频这种形式的真实性有待考量。^[25]根据科尔德森指出的图像刺激的反作用原理，当受众开始意识到自己最初的认同原来是建立在情感化的操控甚至欺骗之上，受众会主动地对图像的再次劝服产生本能的抗拒。^[26]另一方面，视觉欺骗性也会使得公众对所有使用生成式视觉大模型进行新闻生产的主体产生警戒心理，而作为收受方的公众，能否通过“情感真实”完成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于传播主体的信任程度。^[27]公众与媒体信任契约关系的失效，使得“情感真实”的实现遭遇严重阻碍。

四、边界调适：“情感真实”的风险治理路径

应对“情感真实”进入真实性范畴的风险挑战，需不断调适技术边界，共建人机协同的良性内容生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逐渐渗透到新闻生产实践，受科技伦理、资本价值和算法逻辑控制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新闻场域所遵循的新闻价值、专业实践和公众服务理念等存在结构性冲突，^[28]二者碰撞导致“情感真实”发生异化偏移。为实现技术生态下“情感真实”的

可持续维系，本文从真实性溯源、情感调控、认知助推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技术治理路径，正如《俄罗斯报》社长帕维尔·涅戈伊察指出的：在AI帮助下制造的每一个威胁，技术本身都能提供有效的“解药”。

1. 真实溯源：构建真实性“契约”

在深度伪造引发普遍信任危机的背景下，新闻生产领域在积极拥抱新技术的同时，亟待重建公众对视觉影像新闻的信任。可溯源机制通过构建新闻内容可验证、可追责的链条，为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提供有张力的空间。传统新闻源追溯方式存在结构性缺陷，文字或图片形式的源头声明无法对内容本身进行烙印，含有特殊信息（如AI合成）的声明在社交网络的流通过程中被各个节点有意或无意地遗失或篡改，使得溯源难度加剧，内容的真实性难以得到保证。《经济学人》杂志将区块链技术比作“一台创造信任的机器”，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成为数字时代的技术性信任基座。

区块链技术以其去中心化、防篡改、可追溯的特点，^[29]为建立数字化溯源系统提供了强大的技术依托。区块链通过分布式账本和散列链技术对新闻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进行区块链存证，强制标注AI生成内容的技术路径与数据来源，任何修改都会导致哈希值变化，形成“造假即失效”的威慑机制。用户可以通过时间戳和节点间的链接追溯每个新闻产品的传播路径，查验是否在某个节点被篡改与破坏，从而提高新闻内容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安全性。^[25]由此，生成式视觉大模型辅助新闻生产的黑箱操作被转化为可验证的开放系统，从而建立起公众信任的新闻内容的生成与传播机制。

生成式视觉大模型驱动下的“情感真实”需要以客观真实性作为根本内核，但实现“情感真实”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主观创造性的发挥，这也意味着“情感真实”的实现高度依赖语境完整性，当信息脱离原始语义场域或遭遇局部篡改时，极有可能陷入“去真相”的困境。不同于事后验真，区块链从源头上建立了一个可信的防伪机制，从根本上遏制由于恶意篡改或二次编辑导致的失真，是数字时代实现“情感真实”的重要保障。

2. 情感调控：疏导网络舆情

“情感真实”的建构虽以公众的情感唤起为基础，但情感是一种“既能产生团结也会导致野蛮的力量”，^[30]在高度情绪化的互联网时代，只有加强对公众情感与舆情态势的监管与引导，才能避免情感凌驾于真实，让“情感真实”在合理、可控的范围内得以维系。依托情感识别与分析技术，潜藏在公共话语中的信任裂痕得以彰

显，通过靶向化的舆情干预策略及时修复社会共识，是维系“情感真实”与社会信任的重要手段。

当技术渲染突破事实本身的严重程度，将导致公众情感响应与事实的客观呈现结构性错位。生成式视觉大模型生产的新闻内容应避免成为情感操控的工具，在新闻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应把控情感边界，确保情感渲染与事件的性质和严重性相匹配，防范技术僭越引发的社会情感动荡。社交媒体平台信息生态日益庞杂，情感表达形式与内容也愈加丰富。为了高效识别不同模态内容中蕴含的情感要素，可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技术构建多模态情感识别模型，对图文并茂的多模态内容进行情感分析，精确识别和分析平台话题内容与用户观点的情感倾向。^[31]在情感识别与分析的基础上，精细化感知网络舆情态势，及时进行干预疏导。建立智能响应机制，通过弹性的流量调控策略，对积极、治愈的正向情感传播实施强化引导，对煽动性、极端化的情感表达及时调控限制。在必要时还可以通过策略性的信息资源部署和信息框架设置，纠正舆论中的噪音与偏差，主动引导用户的认知与情感。^[32]以技术为依托塑造一个权威且稳定的新闻场域，做到“一个负责的平台，应该对事实表达、观点表达和情绪表达起到激浊扬清的平衡者的运维角色：当社会哭的时候不要让社会哭出沮丧；当社会笑的时候不要让社会笑出狂妄”，才能使得新闻真实不被极端情绪所误导与遮掩。

3. 认知助推：打破认知遮蔽

在新媒介技术与传播环境发酵下，用户正处于信息失序的常态化风险之中，信息过载与算法推荐机制加剧了用户的有限理性，面对情感渲染强烈的新闻内容，用户往往依赖直觉判断，陷入“情感捡拾”而非“理性选择”。^[33]同时数字技术赋能加快了信息生产速度，带来了社交媒体平台审核资源紧张及审核模糊性高的现实问题。在此情境下，AI生成内容极可能通过视觉符号操纵情感表达，模糊真实与虚构的边界，甚至利用情感共鸣进行误导性传播，进一步加剧情感失真的风险。应对动态化、场景化的情感失真问题，需要引入更轻量化的助推治理手段，引导用户关注真实性这一新闻内核。

助推被视为行为治理与行为政策最为典型且重要的方式，旨在在不干扰受众自由选择权的前提下，通过设计选择架构等可预测的微小方式来改变人们的决策行为。^[34]针对社交媒体中的信息失序所带来的认知遮蔽，可借助真实性标识和情境性标识等内容标识线索开展信息助推治理，即在不损害用户自由选择权的基础上，利

用平台可供性，通过为用户提示线索来引导其认知。如针对有争议的、肯定的或正在审核的信息，可以利用事实核查标识来提示信息的真实性状况，帮助用户在平台上消费和传播信息时做出更为明智的决定；^[35]对于过度发酵的情绪化内容，通过更为平衡的传播热度标识，帮助用户情绪“降温”，使其对信息的认识和思考重新回归理性；^[36]对于AI生成的内容可以通过来源标识或风险性标识来提示用户。通过一系列微小的内容标识手段，把用户的注意力从情感的狂欢中“助推”到对于信息准确性的关注上，从而改善信息生态。^[37]

长远来看，规范化的内容标识将隐蔽的技术痕迹转化为可感知的符号线索，向用户展现出平台对待信息内容的严谨态度。久而久之，当内容标识树立起了“形式权威”，这种非强制的助推手段能够重塑用户的信息处理模式，显著提升受众对信息质量的敏感性，最终实现技术生态下新闻信任的可持续维系。

结语

在生成式视觉大模型重构新闻生产逻辑的进程中，新闻真实正在经历激烈的范式转换，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视觉大模型的入场，为内容生产者把握核心情感、勾连动态且多维的事实提供了技术依托。在传统客观记录范式鞭长莫及的情境下，生成式视觉大模型成为再现真实的新方式，通过唤起情感共鸣间接服务于本质真实。在范式跃迁的当下，生成式视觉大模型构建的“情感真实”对基于传统媒介经验所形成的“眼见为实”的媒介观造成巨大的冲击，但二者并非全然对立，更多呈现动态互补关系。“情感真实”逐渐成为新闻真实的新维度，推动新闻真实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延展与深化，以“真实性光谱”为指引，建立传统客观真实与“情感真实”的动态平衡。

当然，本文指出基于生成式视觉大模型所构建出的“情感真实”不是脱离客观事实的悬浮真实，“只有基于客观事实而生的情感，而非截取片面化的利己事实进行打扮后的情绪，才能为公众所接受”。^[16]如何在尊重虚拟内容带来的“情感真实”的同时，防止出现技术异化导致的新闻价值偏移、道德虚无主义蔓延、社会信任消解等风险问题，是处于探索阶段的新闻生产情感构建范式需要直面的挑战。

人工智能的崛起昭示着智媒时代正向我们走来，尽管生成式视觉大模型的应用也许仍无法摆脱“科林格里奇困境”，技术自身的局限性与使用者出于私利的不当使用催生了多重风险挑战，但失序与乱象不应成为阻滞

新闻行业拥抱新技术的借口。我国新闻业应保持谨慎的乐观姿态投身数字化变革浪潮，让技术成为技术威胁的“解药”，践行有效的技术治理路径，引导伦理先行、科技向善，在创新与规制的动态平衡中稳步前行。

参考文献：

- [1] 赵立兵. “情”从何起：数字新闻“情感转向”的现象学反思[J]. 新闻界, 2023(7): 31-43.
- [2] 喻国明, 高娅婕, 章雪晴. “后真相”的形成机制与消解之道：AIGC时代新闻真实的重建——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探讨[J]. 学术探索, 2024(5): 37-45.
- [3] 史安斌, 郑恩. 迈入“融合性真实”：文生视频技术对新闻传媒业态的重塑[J]. 传媒观察, 2024(4): 27-36.
- [4] 徐天博. “后真相”时代的真相建构——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3(2): 135-140.
- [5] 张诗瑶, 沈阳. Sora: 传媒生态镜像进化与认知变革[J]. 编辑之友, 2024(6): 53-60.
- [6] 甘惜分. 新闻学大辞典[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13.
- [7] 常江, 何仁亿. 真实的虚妄：沉浸式新闻的伦理风险探析[J]. 新闻战线, 2018(11): 57-61.
- [8] 战迪, 潘越. “在场”的隐退：人工智能生成图像对媒介真实观的重塑[J]. 中国出版, 2024(18): 28-33.
- [9] 托马斯·库恩, 伊安·哈金. 科学革命的结构[M]. 张卜天,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21.
- [10] 李泓江. 新闻学交往范式的出场：历史逻辑、时代语境与知识根基[J]. 新闻与写作, 2022(2): 57-66.
- [11] 杨保军. 论新闻“理解真实”实现的多元方式及其关系[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43(5): 31-36.
- [12] 蒋晓丽, 钟棣冰. 智能时代新闻游戏的真实性问题探析——基于符号叙述学视角[J]. 新闻界, 2024(11): 4-12.
- [13] 格拉汉姆·哈曼. 铃与哨：更思辨的实在论[M]. 黄芙蓉, 译.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4-12, 35.
- [14] 蔡雯, 周思宇. 主流媒体新闻传播的情感转向与风险防范[J]. 中国编辑, 2022(10): 4-8.
- [15] 蔡雯, 汪惠怡. 新闻传播中的情感：辨析与思考[J]. 青年记者, 2023(12): 9-12.
- [16] Waisbord S. Truth is What Happens to News [J]. Journalism Studies, 2018, 19(13): 1866-1878.
- [17] 张子铎. 拥抱情感：新闻真实与公信力的再反思[J]. 青年记者, 2020(11): 26-27.
- [18] Creech B, Roessner A. Declaring the Value of Truth[J]. Journalism Practice, 2019, 13(3): 263-279.
- [19] 杨保军. 新闻本体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46.
- [20] Varela J, Thompson T, Rosche E.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1: 171-174.
- [21] 王坤峰, 苟超, 段艳杰, 等. 生成式对抗网络GAN的研究进展

- 与展望[J]. 自动化学报, 2017, 43 (3) : 321-332.
- [22] Dhariwal P, Nichol A. Diffusion models beat GANs on image synthesis[C]//Proceedings of the 3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Vancouver: Curran Associates, 2021: 8780-8794.
- [23] 让·博德里亚尔. 完美的罪行[M]. 王为民,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8.
- [24] 陈昌凤, 张舒媛. 视觉优势?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传播的模式偏向问题[J]. 新闻与写作, 2024 (10) : 5-14.
- [25] 徐笛, 梁鹤. 循迹网络: 深度造假与新闻真实体制[J]. 全球传媒学刊, 2023, 10 (3) : 153-169.
- [26] 刘涛. 文化意象的构造与生产——视觉修辞的心理学运作机制探析[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1 (9) : 20-25.
- [27] 蒋晓丽, 钟棣冰. 再论新闻述真变异的重构——基于“文本引导解释”与“收受真实”视角[J]. 当代传播, 2023, (5) : 35-40.
- [28] 徐天博, 严康. 新闻“边界域”: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媒介场域的再造[J]. 传媒观察, 2024 (6) : 58-65.
- [29] 王瑜, 张慧萍. “链上传媒”: 区块链赋能传媒业变革[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3 (3) : 62-66.
- [30] 何雪松. 情感治理: 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J]. 探索与争鸣, 2016, 325 (11) : 40-42.
- [31] 曾子明, 孙守强, 李青青. 基于融合策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多模态负面情感识别[J]. 情报学报, 2023, 42 (5) : 611-622.
- [32] 张敏, 张可, 张东鑫. 政务社交媒体中公众情感治理: 理论框架与实施策略[J]. 情报科学, 2024, 42 (10) : 116-124.
- [33] 刘戡晗, 喻国明. 信息“助推”: 算法时代传播引导研究的新视角[J]. 新闻与写作, 2023 (12) : 68-77.
- [34] 理查德·塞勒, 卡斯·桑斯坦. 助推: 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最佳决策[M]. 刘宁,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6.
- [35] Lorenz-Spreen P, Lewandowsky S, Sunstein C R, et al. How behavioural sciences can promote truth, autonomy and democratic discourse online[J].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20, 4(11): 1102-1109.
- [36] Pennycook G, Rand D G. Nudging social media toward accuracy[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22, 700(1): 152-164.
- [37] Morrow G, Swire-Thompson B, Polny J M, et al. The emerging science of content labeling: Contextualizing social media content moderation[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2, 73(10): 1365-1386.

"Affective Truth": An Exploration of the Paradigm Iteration of Journalistic Truth under Generative Visual Large Models

YU Guo-ming^{1,2}, HUANG Rong², ZHANG Luo-yu²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and the Platform for Future Media,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mong "technology-affect-truth", exploring the affective turn in journalism driven by generative visual large models and how emotional elements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journalistic truth. Facing the emerging production practices in journalism, the interpretability of traditional paradigms of journalistic truth encounters bottlenecks. In respons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affective truth" and analyzes the paradigm shift between old and new conceptions of journalistic truth. It examines the legitimation process of "affective truth"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technological domestication, cognitive conflict, and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To address the risks posed by the inclusion of "affective truth" within the scope of journalistic authenticity,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corresponding paths for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in terms of truth traceability, affective regulation, and cognitive nudging, aiming to promote a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regulation in journalism.

Keywords: Sora; generative visual large models; "affective truth"; journalistic truth

(责任编辑: 吕晓东)